

# 行動宮廷在江南

## 乾隆南巡行營的作用

張勉治 著  
邱士華 譯

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的「行篋隨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特展，標舉出乾隆皇帝在他著名的「南巡」旅程中對漢族書畫藝術的賞鑑與持續的收藏。本文將針對這個在江南活動的「行動宮廷」帶來的視覺衝擊略做論述，希望對乾隆南巡的認識再做些許補充。

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是牽涉廣泛的大事件。每次南巡耗時三、四個月以上，規模龐大的隨扈陣仗在各地（包括帝國境內最繁華的江南）驚人的開銷。（圖一）乾隆皇帝及其隨扈的南巡旅程先由陸路開始，自直隸、山東到江蘇北部，接著在黃河和大運河交界的清河縣察看當地複雜的水利建設，包括水壩、堤防、運河等。渡過黃河後，整個行動宮廷開始藉由大運河旅行，過訪運河沿岸如寶應、高郵、揚州等主要城鎮。他們在揚州以南渡過長江，停靠常



圖1 乾隆皇帝南巡路線圖 作者提供



圖2 清 沈貞 紫閣元勳兆惠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而皇太后的船隊則以比較悠閒的速度推進，通常略遲幾日才回到北京近郊。  
如前文所述，乾隆皇帝在南巡旅程進行的活動非常多。他勘查水利建設、祭拜地方神祇、考核地方官員、接見地方名門仕紳、恩賜臣工、詔選文學優長之士、閱兵、遊賞著名景點或是古蹟，甚至還接見了來自內亞（註一）的使臣。

州、無錫、蘇州、乃至浙江省北部。其中一次還會深入浙江嘉興才回到杭州府，於當地舉行恩科會試、閱兵並巡幸西湖美景。在後面四次南巡時，乾隆皇帝會直接前往海寧視察杭州灣的海塘工程，之後再回杭州。一七五一年，巡行隊伍自杭州渡錢塘江，祭奠位於紹興的禹陵。這是他六次南巡所達最南之處，而且除了第一次南巡以外，之後也不再前往。  
北返的旅程則沿著大運河回到江蘇，在長江南岸轉向西行，由陸路前往明朝首



圖3 清 丁觀鵬 紫光閣凱宴成功諸將士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但是到底南巡真正的面貌是什麼？特別是深入江南的這個移動宮廷到底導致了什麼樣的視覺衝擊以及象徵意義？  
當我們想像這些皇家的南巡旅行時，既定印象多半將乾隆皇帝視為一位至高無上的文人觀光客。他臨訪江南景點，也用自己的御筆或御題吟詠這些山水。畢竟乾隆皇帝身處的江南，不但是「魚米之鄉」，

都江寧（今日的南京）。乾隆皇帝在此處亦舉辦恩科考試、閱兵、遊覽史蹟。一七五一年第一次南巡時，他在江南停留最久：杭州停留九日、蘇州停留八日、江寧停留四日。接著這移動的宮廷重返鎮江渡過長江，沿著大運河北上至黃河交匯處。一七五七年第二次南巡之後，乾隆皇帝及其重要的隨行人員在山東、江蘇邊界與母親崇慶皇太后的船隊分離，藉陸路前往徐州勘查黃河沿岸水利設施。自徐州返回大運河後，方又藉舟北行，經德州回到北京。

同時也是漢文人精緻文化之堅強堡壘。乾隆皇帝在南巡途中的詩文創作量龐大。（註二）本次特展便展出許多與御製詩文相關的作品。此外，許多大臣和地方仕紳也藉由繪畫或是歌曲紀念皇帝巡幸。豐富的視覺以及詞曲材料吸引了研究者廣泛的注意，並深刻地影響了我們對於乾隆皇帝南巡的認識。不過我在這裡想要建議另一種觀點：雖然將乾隆皇帝南巡當作是對漢文化的欣賞或撫慰這種主流看法是正確有效的，但只反映了部分的事實。

我們比較少考慮乾隆皇帝南巡如何將清廷化為一個行動實體這個更樸素的問題。我們應該很清楚每一次南巡這個行動宮廷都實實在在出現於江南。這是南巡的特點，也是南巡的核心景觀。下文將繼續討論乾隆皇帝南巡時透過後勤管理（logistical management）以及持續的行營駐紮，暗示著乾隆皇帝對邊境式移動力、宮廷軍事力量以及清皇朝非漢起源的好尚。

### 御用行營之後勤管理

乾隆朝將巡行時的後勤管理當作一種類軍事的作為。主導者為京城中的八旗貴





圖8 清 郎世寧 畫弘曆圍獵聚餐圖 軸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7 皇帝駐蹕御帳 《皇朝禮器圖式》18卷 清乾隆31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清 郎世寧等 木蘭圖 局部 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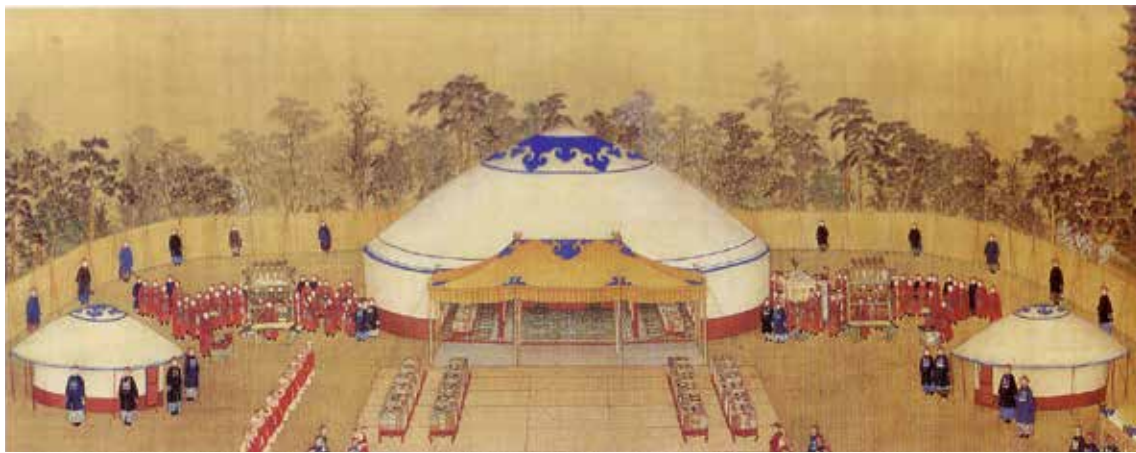


圖9 清 郎世寧等 萬樹園賜宴圖 軸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滿族顯宦兆惠（一七〇八—一七六四）與努三（？—一七七八）為前四次乾隆皇帝南巡的嚮導統領。兩人皆正黃旗出身，戰功彪炳並嫻於後勤事宜。兩人也都親臨乾隆皇帝著名「西師」（一七五五—一七五九）戰線。（註三）圖二描繪的就是身著全副盛甲的兆惠，紀念他在伊犁河及塔里木盆地綠洲的大捷，也就是一七六〇年以後所謂的「新疆」。畫上題寫著「綏疆懋績」。這是陳列在北京紫光閣一百幅功臣圖中的一張。（圖二）「紫光閣」建於一七六一年，以供乾隆皇帝宴請內亞部族朝貢使節之用。這些使節有時候也隨其南巡。（圖三）諸部族的長老與領袖應該有機會見到這些畫像，而類似兆惠和努三這類將領大概也不會錯過這些功臣圖。

除了在南巡之前以及途中進行偵察任務外，由兆惠等人率領的嚮導處在長城以北舉行的木蘭秋獵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他們在木蘭圍場中負責選定特定的狩獵區域以及御營大帳所在。（註四）由木蘭秋獵與南巡後勤人員的一致性看來，深入江南的乾隆朝宮廷彷彿如同內亞部族菁英們的部隊正進行一場軍事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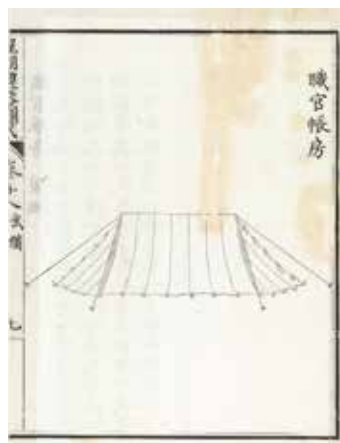


圖5 職官帳房 《皇朝禮器圖式》18卷 清乾隆31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皇帝駐蹕大營 《皇朝禮器圖式》18卷 清乾隆31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行營作為軍事力量與民族正統 (Ethnic Authority) 的表徵**

行營可能是清廷主張自己傳承了內亞民族軍事行動性及力量最鮮明的投射。圖四是大營的簡要圖式。中央圍成的長方形牆面稱為「黃城」，代表行營的中心，也是皇帝個人所屬的區塊。（圖四）一百七十五個簡單的「職官帳房」（圖五）環繞成圈狀「內城」，與另外兩百五十四個職官帳房組成的第二圈形成一道安全警戒線。侍衛親兵（圖六）在各入口處擔任哨兵。黃城中皇帝真正過夜的區域幾乎都是圓形帳棚，也就是俗謂的「穹廬」或「蒙古包」。（圖七）

蒙古包在宮廷繪畫中經常出現，如郎世寧（一六八八—一七六六）的《畫弘曆圍獵聚餐圖》（圖八）或《萬樹園賜宴圖》（圖九）皆可得見。《萬樹園賜宴圖》是一七五四年奉敕繪製的畫作，用以紀念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的杜爾伯特部由其首領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孟克（史稱三車凌）三臺吉率領歸附之事，畫中特別描繪一座御臥大蒙古包。圖十則是比較簡化的行營圖像，其中可見用作黃城的一些蒙





圖11 清 烏什酋長獻城圖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清 拔達山汗納款圖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古包以及行帳 (bunting)。(圖十)

描繪侍衛及蒙古包的圖六及圖十，實際上擷取自一七五〇年代郎世寧監製的〈木蘭圖〉卷中的若干細節。(註五)



圖10 清 郎世寧等 木蘭圖 局部 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藏

這些行營一方面是軍事力量的精鍊符號，一方面也是深入內亞的清朝勢力之投射。圖十一及圖十二分別描繪著一七五八年烏什酋長以及一七五九年巴達克山汗獻降時的營帳。(圖十一、十二)

這兩個行營的形象來自完成於一七六六年共十六張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這套戰圖同樣由乾隆朝廷傳教士負責監造。為行文之便，以下我將稱此作為〈得勝圖〉，這也是在一七七〇年代以後此作常用的簡稱。這十六幅〈得勝圖〉圖繪於展示許多軍事英雄肖像的北京紫光閣壁面上。(註六)如同前文討論過的各種圖像所證，以蒙古包組成的大型環狀行營是內亞民族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文化的重心除狩獵之外，也包括了內亞游牧民族間的實際戰事與外交折衝 (diplomacy)。

然而，如圖四到圖十二的營帳是否也在乾隆皇帝南巡江南時使用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先回到另一組宮廷繪製的〈南巡圖〉卷。清代宮廷共有兩套〈南巡圖〉卷，每一套都有十二幅。第一套是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一六五四—一七二二，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在位)首次南巡的紀念，由蘇州籍的文人畫家王翬

(一六三二—一七一七)領銜於一六九一年繪製完成。(圖十三)從不逾越皇祖規格的乾隆皇帝後來下令繪製另一套紀念他自己南巡的圖卷。這套〈南巡圖〉卷則由蘇州籍的漢人宮廷畫家徐揚(一七一二—一七七九以後)領銜，完成於一七五〇年代到一七六〇年代間。

透過對兩套圖卷出版品的審視與研究，會發現無論康熙朝或乾隆朝的〈南巡圖〉卷對行營都沒有著墨。(註七)且不論整座皇家行營，連一個小蒙古包也沒有出現。充其量只有康熙朝〈南巡圖〉第一卷的一個小局部，有兩隻駱駝負著蒙古包的骨架於背上。(註八)

如果天真直率地以為〈南巡圖〉卷就像鏡子般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情況，那麼就會錯誤的做出南巡並未使用如圖四至圖十二所示的那種蒙古包的結論。無論如何，無論在檔案或是已出版的資料中都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證實乾隆皇帝南巡時採用兩套環狀大型行營的裝備，並以部隊交互躍進式的方式運用於旅程中。

當然，行營不是南巡帝王駐蹕時的唯一選擇，他也可以在更永久性的建築如行館或行宮中停留。的確，乾隆皇帝歷次駐





圖13 清 王翬 康熙南巡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蹕的地點越來越以行宮為主。這些行宮多修建於一七五〇年代晚期到一七六〇年代。但是駐蹕在行宮並不排斥在江南使用營帳。畢竟，就算是最宏偉的行宮也無法容納得下乾隆皇帝約兩千到三千的隨扈官員兵丁。檔案資料顯示在第三次與第四次南巡時，軍機大臣、地方大員均經常宿於帳棚中。

南方感知的詠獻，也不必然代表南巡本身只是漢文化意義下的撫慰性的活動。因為這些南巡圖像的觀眾是可以進入北京內廷活動的極少數。而內廷正是專家們認為這些圖像存貯之處。(註十一)然而，南巡時皇室行營與蒙古包在江南地區的使用，實際上更有更廣大的參與者和觀看者。

在皇帝與征服者集團眼中，乾隆皇帝

即使在五個興築行宮的駐蹕點，也需要總數約一千一百頂額外的營帳。

此外，在每日旅行途中，皇帝會在一兩座尖營（或稱墩營、烏墩）用飯或接見地方官員。旗人也會在尖營搭建中層的日用帳棚。(註九)就像圖十四所示，這些中層營帳的主要結構就是蒙古包。(圖十四)(註七)

圖十四所描繪的中層帳棚與郎世寧在圖八〈畫弘曆圍獵聚餐圖〉所呈現者非常接近，這很值得細細品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七五五年乾隆皇帝下令負責在中層營帳負責後勤及維安的四名佐領（Colonel）以及六十名侍衛（guardsmen）中，其中一名佐領及二十名侍衛必須為蒙古籍。也因此，雖然乾隆皇帝南巡途中的行宮建置得越來越多，但帳棚和蒙古包卻沒有消失。相反的，乾隆皇帝更堅持繼續使用這些帳棚。簡而言之，皇室行營以及蒙古包都具有極重要的象徵意義，即使在人口稠密以漢族為主的江南城鎮亦不例外。

這很諷刺地讓我們學到當思索南巡帶來的視覺衝擊時，不能全然依賴宮廷繪製的南巡圖像。就像前文所述，〈南巡圖〉卷並沒有清楚提示乾隆皇帝南巡時到底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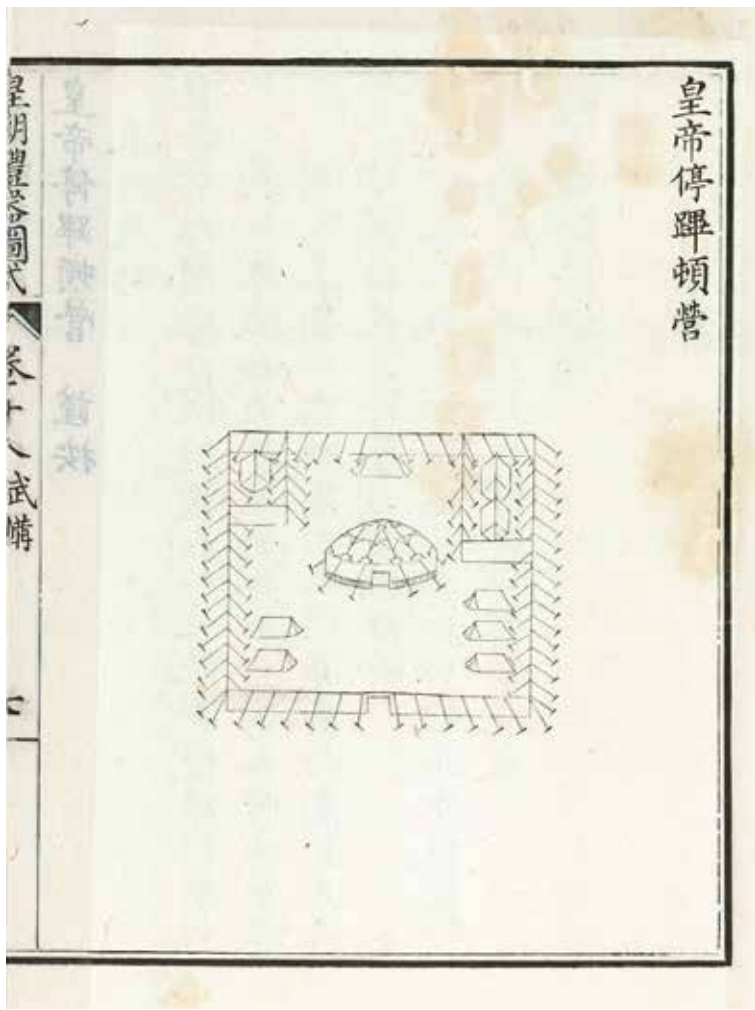


圖14 皇帝停蹕頓營 《皇朝禮器圖式》18卷 清乾隆31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巡的行營指涉的是更屬於游牧及部落模式的統治與政治組織。在此模式中「行動力」本身就是安全的憑靠，也是戰力的標誌。根據乾隆朝著名的宗室歷史學者昭槁（一七八〇—一八三三）於《嘯亭雜錄》中的描述，行獵或南巡時使用行營不只是「崇尚儉樸」，更兼「不忘本」之意。乾隆皇帝在第一次南巡時將行營比擬為如同在廣

沒有用帳棚。相反地，作為歷史學者應該更加倚靠如則例、檔案、御製詩文等文字資料以瞭解相關資訊。

那麼清代宮廷繪畫以及其他視覺材料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呢？這些材料究竟揭露了過去的那個部分？很清楚地，沒有任何一張宮廷繪畫需要以直接或正面的方式再現真實。相反的，這些畫作都是已經沾染到特定意識形態的資料，是爲了延續南北、文武、漢族與內亞民族文化及政治認知的嚴格而僵化之界線。

有三組宮廷繪畫可讓我們揭露這重要的文化差異的紛爭，並可重建營帳與蒙古包的使用在南巡中的重要意義。若將〈南巡圖〉卷、〈木蘭圖〉卷、〈得勝圖〉並觀同時反向思考，會發現這幾件作品組成一個巧妙的視覺分類（或者說象徵指標 symbolic index）。在這個分類中，營帳和蒙古包完全與內亞風光以及具有高度行動力及軍事化的政治文化連結起來。而南巡畫作則像是對南方山水、江南繁榮城市及其政治感知的歌詠。相對於這些高度理想化及刻板化的南方山水，如果在其中寫實描繪出營帳或蒙古包將會顯得相當不協調。不過，若將南巡圖像視為對精緻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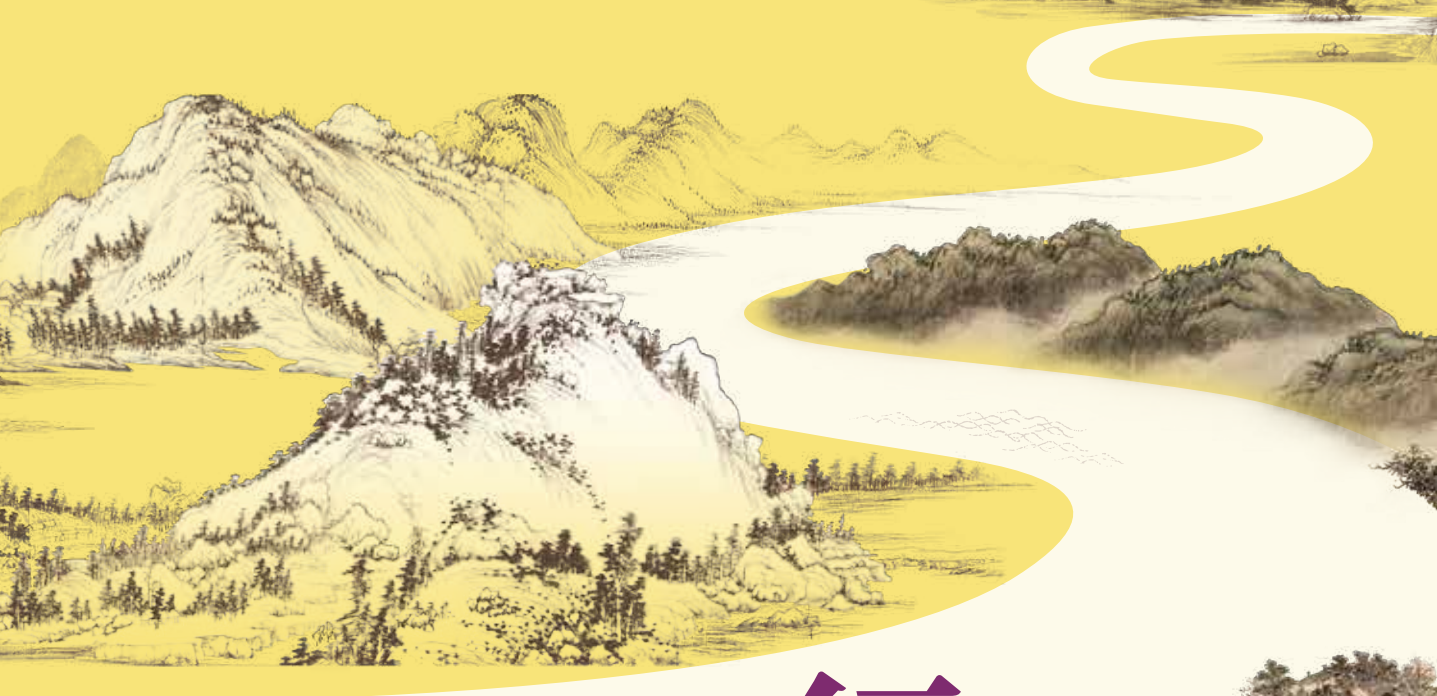
闡草原上奔馳的行動力。作於一七五一年五月初的這首〈氈室〉御製詩很值得留意：

陸宿仍毳室，虛窗駒影留。往來任南北，寒暖適春秋。乍覺招新興，兼宜縱遠眸。頓移廬不改，擬合喚原舟。（謂平原之舟也）（註十二）

江南的漢族菁英也瞭解乾隆皇帝使用行營所蘊藏的軍事意涵。如蘇州著名的文壇領袖沈德潛（一六七三—一七六九）便會提及自己在一七五一及一七五七年謁見乾隆皇帝時，是在黃河與大運河交匯的清江「武帳」中。(註十三)

見識過駐紮在南方「行營」的江南漢族菁英想必很多，但他們卻有意無意地避免提及。因為「行營」對他們來說正象徵著清廷的非漢根源，以及對內亞民族外交與軍事征服的成見。如同前文所述，〈得勝圖〉中的軍營是很清楚地描繪在紀念戰動的紫光閣的壁面上。這代表見過這些圖像的人不只內亞朝貢使節或臣子，也包括許多籍屬江南的中央官員。此外，這些內亞民族征戰、外交的影像也不僅僅流通於京城的官員。事實上，以同樣主題製作於巴黎的戰功銅板畫，在乾隆皇帝最後第六次南巡結束不久的一七八四年六月，分別





# 行篋

## 隨行

— 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

TRAVELING with AR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ccompanying the  
Qianlong Emperor's Southern Tours



4.01 — 6.25

陳列室 GALLERIES  
208,210,212

11143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No. 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43, Taiwan (R.O.C.)  
http://www.npm.gov.tw | Tel: +886-2-6610-3600 | Fax: +886-2-2882-1440



圖15 清 平定回部獻俘圖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安置到南巡途中所經的十四處地點。(註十四) 南巡時各地官員仕紳接駕的場面，應十分相像或類似於〈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中內亞部落領袖獻降的情況吧！(圖十五)

如同我期待於前文論述中證明的，將乾隆朝宮廷化為「行動宮廷」所需的作為與過程，不僅是實務操演或後勤補給的問題，實際上也帶著強烈的象徵與意涵。就

最基本的後勤管理與物質性來說，乾隆皇帝南巡極似由滿族、蒙族及八旗菁英領導的儀式性軍事演練。就這個層面來看，南巡是皇權正統性浸染了種族意識的變相軍事投射。藉由加入對皇室巡行這個層面的考慮，未來我們也許可以對乾隆皇帝南巡獲得更全面以及更為細膩複雜的瞭解。

作者為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歷史與藝術學院副教授  
譯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 註釋

1. 本文所用「內亞」一詞，大致意指亞洲游牧民族所在地區，相對於亞洲農耕文明區域。
2. 參見 Michael G.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 322-324.
3. 有關「西師」可參閱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二，頁九一—一〇一；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70-292;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4. 王淑云，〈清代北巡御道與塞外行宮〉，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九，頁二一—二七。
5. 畢梅雪、侯錦郎，〈木蘭圖與乾隆秋季大獵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二，頁九八。
6. 參見 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p. 74 以及〈清 慶桂等編，
7. 《國朝宮史續編》，卷九七，頁九六〇—九六六。
8. 非常感謝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研究員劉怡璋 (Gony [i])，他提醒我注意乾隆朝〈南巡圖〉中一個暫時性的建築。雖然帳棚的骨架出現於〈南巡圖〉中，但並不是構圖中重要的元素，也沒有什麼特別接近行營的表現。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一九九一，冊二，頁八八六。
10. 吳振棫，〈養古齋叢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頁四八。
11. 托津等纂，〈大清會典（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九一，卷八七四，頁三一—三三三。
12. 參見 Maxwell K. Hearn, "The Kangxi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 A Narrative Program by Wang Hui,"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0), pp. 63-4.
13. 高晉編，〈南巡盛典〉，臺北：新興書局，一九八八，卷十一，頁二六。
14. 沈德潛，〈沈德潛自訂年譜〉（乾隆二十九年序教忠堂刊本），頁四四、四五。
15. 薩載等續編，〈欽定南巡盛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卷八一，頁五。安置的地點包括寺廟和揚州、無錫、蘇州、杭州的著名景點。